

唯物史观制度理论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

张俊生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操作, 应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制度理论层面加以阐释。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唯物史观制度理论认为, 交往是制度的历史性起源, 制度是交往的产物, 制度的现实基础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 制度对社会生产具有规范作用, 其根本诉求是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的确认。制度建构要充分体现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根据唯物史观制度理论,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要遵循制度标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理论化与生活化相融合的原则。

关键词: 唯物史观制度理论; 新时代; 意识形态; 制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 G641;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092(2022)06-0028-06

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意识形态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指向,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 应是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应然统一”的状态, 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中,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三权统一”依然存在不少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建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 因为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 管根本、管长远。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操作, 更应从制度理论层面加以阐释, 理论彻底才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唯物史观制度理论为根本遵循。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制度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制度的研究并不是聚

焦于制度本身, 而是从制度存在的更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和把握,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 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 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新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2][30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制度”是分析经济制度的基本范畴, 首先要对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整个社会制度基础进行分析, 然后才能对居于其上的道德、宗教、哲学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作出合理性的解释。一定制度确立的过程就是一定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 并且与这种生产关系相协调、相适应, 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对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和规则确立起到保障和维护的作用。唯物史观制度理论对制度的理解和把握是从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始的, 并通过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相结合去理解制度的内涵。

(一) 制度是交往的产物

自从有了人类的生产实践就有了人们之间的交往, 交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 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现实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的人, 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是现实的人能够生存的

收稿日期: 2022-10-28

作者简介: 张俊生, 男, 安徽怀宁人, 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研究。

第一个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就发生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现实的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交往关系的网络之中的存在。对各种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和秩序化，就产生了制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这样阐述：“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2]202}“这种存在状况”无疑就是规范化、秩序化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制度作为“交往的产物”在这里得到进一步阐释。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3]260}在这里，恩格斯用“共同规则”来表示制度，这不仅说明了制度的历史性起源，还解释了制度形态演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制度谈制度，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在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活动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的人的交往活动出发，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阐释制度。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人类突破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制度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制度也取得了世界范围的约束力。

（二）制度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

制度不仅仅是人们思维和观念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它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产物和反映。马克思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4]制度就是对这些“特有的法的关系和统治形式”的规范化表达。作为关系范畴，制度发挥中介作用和整合功能，使其关系具有现实稳定性和未来可预期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在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跨越的过程中，制度以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调节以“人”为主体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使人结成社会，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因此，制度在本质上又属于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潜在的、抽象的，只有通过具体的制度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种种规范，抽象的、潜在的社会关系才能得到现实的表现。如果没有制度这一交往的中介，社会关系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之中，那么，人就将失去现实的规定，游离于自然状态，人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人。当然，社会关系是多

层次、多方面的交往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也相应是丰富和复杂的。

（三）制度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形式

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形式发挥着传递信息的功能，在运行过程中通过预防、协调、惩罚、矫正等方式发出明确信息，并由此成为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制度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制度提供了人们交往的规则，能使复杂的社会交往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使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更容易发生。制度规则对人的限制、约束，是为人的行为划定的一条边界，它意味着人的行为越过这条边界就会受到社会习俗道德的排斥和谴责，受到执法部门的惩罚。

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形式还具有营造社会交往环境的作用。制度为人们社会活动形成的经济、政治、道德、法律、伦理等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一个稳定的规则框架，也形成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一个公正高效的规范化形式能造就积极有效的社会交往环境，而一个不平等低效率的规范化形式会造成混乱、充满暴力、削弱社会发展的环境。制度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和层次，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交往实践活动。经过一定时期，人们形成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释制度的规范作用，他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340}制度是“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所蕴含的规范性内容，“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为了生产而发生的，这种联系和关系往往以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旦发生就会对社会生产起到规范化的作用。

（四）制度是利益关系的对象化形式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利益是人们之间最直接、最具体的关系。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物质产品的占有、使用和支配，进而产生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不仅仅

关注人们的物质利益，同样关注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物质利益是基础，政治利益是核心，精神利益是灵魂，三位一体构成利益系统。为调节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而产生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就起着对利益关系进行规范和调节的作用，并以一定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固定下来，成为人们交往时所遵循的社会规范。

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不同阶级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社会制度是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的确认。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制度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工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利益关系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活动。国家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其维护阶级利益的职能得到了充分展现，“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2]212}，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所建立的各项制度都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确认和保障。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制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曾说过，法权关系、统治关系都产生于他们特有的生产形式。所以，对于制度本质的理解，既不能局限于制度本身，也不能仅从人类精神发展的视角出发，而应该从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发掘制度产生的根源。制度不仅仅是人的观念、意志、思维的表现，而且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它根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实践之中。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制度的本质特征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制度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制度的产生和变革的根源是经济关系。不同时代的经济关系决定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建构在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整个上层建筑即社会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制度的更替归根到底要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寻找，一旦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制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制度历史是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紧密相连，是依附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历史而发展的，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制度的现实性是指每一项制度必须针对现实实践。任何制度，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或特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与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追求联系紧密，

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一项制度背后的本源精神，即创设此项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所追求的价值是稳定不变的。制度的历史性决定了制度存在的时间界域，而制度的现实性决定了制度存在的空间界域。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变革，是历史的时间和现实的空间交汇的结果，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

（二）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制度的社会形态是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由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制度呈现出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历史形态。不管是“五形态理论”还是“三形态理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6]。由此可见，制度的历史形态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它逃脱不了历史时空限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生产力印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 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标志性“建筑”——社会制度，它的生成与变革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客观规律之上的，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制度的客观性并不是说人在制度面前是无能为力、毫无作为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任何现实的制度存在又都是人们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积极创造和建构的结果，同时，人们又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理想目标不断变更、调整、完善制度。制度演化和发展是客观性和主观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制度的客观性必须通过制度的主观性才能得以体现，而制度的主观性只有在制度客观性基础上才能呈现其合理性。

（三）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制度作为制约和影响人们社会行为选择的规范系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社会交往的产物，在一定的时空界域必须要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社会交往的程度相协调，保持相对稳定。只有这样，制度才能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预期，才能起到规范、约束和激励的作用，从而维护社会交往的相对和谐，为社会生产提供稳定的环境。制度的稳定性

和持久性越高,社会信任度就越高,人们的行动越有预见,交往就越频繁而合乎规则和富有成效。从历史逻辑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运作规则,其产生于社会交往,也应该随着社会交往的变化不断创新。不顾历史环境的变动,野蛮地坚守,制度就会失去它本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走向机械和僵化,变成限制社会交往和限制人性发展的教条。马克思曾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7]。制度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动性则是绝对的。制度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总是体现为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

(四)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任何制度都蕴含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人们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知识和判断力,它以道德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各种关系之中,人通过价值理性来改造和完善自身,改造与自身相关的各种关系,价值理性是自己为自身立法。它关注主体活动“应是什么”“是否应该”及“为何应该”的问题,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理想和价值判断;而工具理性是实现既定目标的实践手段和行为方式,它注重主体活动的实践程式和操作技术,关注主体活动“是什么”,既定目标“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质上属于一种操作规程和实践能力。对于制度而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内容蕴含着制度建构的两重内在含义。制度建构一方面包含着人们对现存社会的反思、批判和重构,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和追求,通过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实现人的根本利益,从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形而上的“道”的含义;另一方面,制度建构以效率和实用为主要目标,内含着一系列的规则、程序、机制以及推动制度有效实施的技术、方式、方法等,属于形而下的“器”的范畴。制度的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目标指引和理论支撑,制度的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实践路径和技术支持。缺乏价值理性的制度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同样,缺乏工具理性的制度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好的制度设计,应当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把握好平衡点,实现制度内在价值承载最大化与制度的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两者的兼得。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应遵循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153}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道路和制度模式,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1]185},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构,必须准确把握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唯物史观制度理论为根本遵循。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要遵循制度标准及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1002}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并决定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方向。

社会发展程度是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的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状况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从根本上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由于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也应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它必须和社会现实相适应、相协调。

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它会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当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的水平不符合(落后或者超前)社会发展程度时,就会造成整个社会发展的紊乱。落后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必然会阻碍社会发展;当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的水平超越社会发展的要求时,它也会由于其虚幻性而脱离现实的土壤,变得虚无缥缈不具备现实操作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程度,在此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则是由实践来完成的。

第二,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要遵循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制度建设是手段而不是目

的,制度建构是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实践,是否成功有效,应从科学性和价值性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制度建设的评价尺度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制度建设目的直接相关。制度的评价尺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力尺度、社会公正尺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尺度。制度的科学性是指制度建构要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学说体现,其终极理想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的价值性蕴涵着人们对终极理想的追求,把未来社会建设成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8]。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围绕其进行的制度设计、制度实践必须体现科学真理性,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本身不能直接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它在现实生活中起着禁止、约束、规范、激励和协调的作用,具体化为人们所遵循的生活基本准则,从而外化为人们的行动模式,引导和约束人们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同时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合和统一人们的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价值性的终极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只有使人的利益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能成为现实。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不是为了约束人,而是满足人的正常需要和对正当利益的追求。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在这里得到统一。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要遵循理论化与生活化相融合的原则。任何社会制度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的获得除了法律上确证,还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等进行系统化、理论化论证。制度进入哲学层面,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什么是”的问题,而是“是什么”的问题。围绕“制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对制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梳理与探究。更进一步讲,哲学视野中的制度研究所关注的不是制度现象的实然情景,也不仅仅是制度现象的应然状态,而是制度的实然和应然的最终根据和理由,是对人、社会与制度的相互

关系在自己时代水平上的根本认识和理解,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制度进行考察。但制度的最终的指向是“现实中的人”,要实现由哲学层面向社会存在的转化,制度必须嵌入“现实中的人”的日常生活的维度之中,实现理论化与生活化相融合。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既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需要通过建构意识形态领域制度提供坚实保障。意识形态工作制度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个层面构成,从不同维度支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在我国制度框架中属于总的指导思想,对所有制度建构都发挥着思想引领的作用;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制度体现了根本制度的内在品质和要求,是根本制度的基础;意识形态工作重要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时效性和针对性较强,体系了创新性和发展性特征,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活力和生机所在。意识形态领域制度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制度体系,理论化、系统化是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得到理论认同、相互协调、有效实施的基础。但是,一旦高度理论化、系统性,就会与社会现实产生距离。“在意识形态王国,理论家以其思想去解释或展示其行为与人格;在生活世界,普通大众则更多地以统治思想言说者之行为与人格来演绎、解读其思想。”^[9]意识形态建设要落到实处,除了要关注那些高精深的学术领域,还要关注这些充斥着大量感性、自发言论的日常生活领域,及时发现其蕴藏的思想苗头,通过各种耐心细致的说理,引导民众凝聚共识。所以,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必须跨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与“现实中的人”的日常生活衔接,才能有效地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的理论化是生活化的前提,而生活化则是理论化的落脚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3.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

- 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8.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2.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5.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 [9] 胡潇.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多视角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2010（4）：20.
- 【责任编辑 杨明贵】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Bette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ZHANG Junsheng

(School of Marxism,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s the high unity of science and value, the new era of ideological work system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level of operation, should be explained from the level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ystem theory, as long as the theory thoroughly can convinc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munication i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communication, the practical basis of the system is the way of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system plays a normative role in social production, and its fundamental demand is to confirm the power based on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we should fully embody the unity of historicity and reality,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of adapting the institutional standard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unit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with the value, and integrating the theory with lif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new era; ideology; construction of system



(上接第19页)

- [8] 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责任编辑 杨明贵】

Integrating the Party-Building Spir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Value logic, Internal Congruence and the Right Way

PU Lixia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l attribut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eaching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and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we can guide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PC,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an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persuasion, appeal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become the natural way for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to be integr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tegrate into; coincidence; way